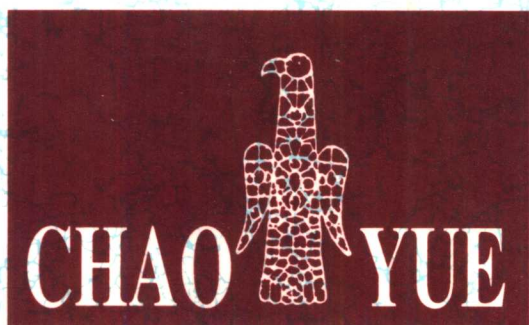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戴茂堂 著

超越自然主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

超越自然主义

——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

BEYOND NATURALISM

— A Phenomenological Angle
of Kant's Aesthetics

戴茂堂 著

Dai Mao Tang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戴茂堂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12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ISBN 7-307-02683-x

I. 超… II. 戴… III. ①康德, I(1724-1804)—美学—现象学 ②现象学—美学—康德, I(1724-1804) IV. B 516.31
B83~069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中南金刚石工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430081 武汉市青山任家路吉林街1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插页4

字数:327千字 印数:1—2000

ISBN 7-307-02683-x/B·66 定价:2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湖北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编

学术顾问:张世英(Zhang Shiying)

梁志学(Liang Zhixue)

杨祖陶(Yang Zutao)

张传湘(Zhang Chuanxiang)

刘简言(Liu Jianyan)

邓晓芒(Deng Xiaomang)

Heribert Boeder(别德尔)

Johnny Erling(埃林)

主 编:江 畅(Jiang Chang)

副 主 编:戴 英 豪(Dai Yinghao)

强 毅 华(Qiang Yihua)

魏敦友(Wei Dunyou)

编 委:朱 正 林(Zhu Zhenglin)

许 凯(Xu Kai)

舒远招(Shu Yuanzhao)

邓安庆(Deng Anqing)

吴守祥(Wu Shouxiang)

彭富春(Peng Fuchun)

曾小平(Zeng Xiaoping)

郭大俊(Guo Dajun)

高乐田(Gao Letian)

冯 军(Feng Jun)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总 序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伟大的显著标志就是她富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拥有高度发达的哲学和文化，其思想文化界的巨子有如天穹的群星，璀璨夺目，不可胜数。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进一步评介、研究、借鉴德意志思想文化，对于促进中德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对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民主政治，其意义自不待言。

1986年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创办了《德国哲学》丛刊，为中国人了解德国开辟了一个“窗口”，为中德思想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今天该所又编辑出版《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旨在集中国内对德国哲学、文化有兴趣、具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对德国哲学、文化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以洞察其奥秘，领悟其精义。这必将成为我们中国人了解德国的一个新“窗口”，中德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座新“桥梁”！

时下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为众所周知，但我们相信，有湖北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有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同仁的竭心尽力，有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和同行专家的热情关怀，有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卓识远见，《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必定能在困境中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江 畅

1994年10月于武汉

1

04703/03

序

杨祖陶 邓晓芒

本世纪初，当康德的名字刚刚为我国学术界所知悉之际，欧洲大陆正悄悄地兴起一场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这就是以胡塞尔为开创者和主要代表的“现象学运动”。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两次划时代的重大转折，人类在150年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胡塞尔逝世1938年）拥有这两位巨匠，是时代的幸运。而这两位哲学大师的思想又是那么接近，如果不是他们各自创造性的建构及所造成的颠覆性的后果，简直可以看做同一个思想的继续发展，至少也是隔代遗传。

然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所有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两个名字又是最难于接近的。当年王国维向西方求学，慕康德之名而趋之，终因其“不可爱”而转向了叔本华，正如同今日学人纷纷炒热海德格尔而冷落胡塞尔一样，表现出中国人在最理性的哲学事业中骨子里仍然是个情感主义者，或思想上的“享乐主义者”。中国学者一般来说往往是研究谁就是谁的信徒，不喜欢的对象决不肯下功夫去研究，这就叫做“知行合一”或“言行一致”、“为学与为人一致”，但实际上导致一种自我封闭，缺乏思想上的开拓精神。中国的思想家崇尚体验，讨厌逻辑和方法论，不耐烦事先在工具上作细致的打磨，总想一下子直接把握真理，“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是阻碍我们走近西方精神核心

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康德与胡塞尔都是方法论大师，就此而言，他们是西方精神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代表。当然，他们最终都要返回直接性，在康德，是回到信仰，在胡塞尔，是回到直接的“生活世界”和体验。但这在他们决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更不是“一念之间”即可成就的。在读他们那些文字枯燥、思想艰深的大部头著作时，我们会不由得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感到他们忍受思想炼狱的耐力和内在生命的顽强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不过，一个有心献身于哲学这一艰苦事业的人，不会停留于这种惊叹，而会起一种模仿的冲动，呼应着他们的自由的召唤而去作创造性的开拓。戴茂堂君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就是这方面一个可喜的实例。

国内对康德美学的研究，往往是就事论事地撷取他的个别观点来加以评述，然后将这些单个评述没有遗漏地连缀起来，由此构成一个“体系”；要么就将他的各种观点都拿来当做自己既定的某个体系（或是中国传统审美趣味，或是自己的某种哲学立场，或者甚至是一整套抽象的教条）的证明或反证。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康德美学方法论的考察。例如，在谈到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非概念的合规律性”、“天才”、“游戏”等等思想时，许多人可以洋洋洒洒，大加发挥甚至发挥过度；但一谈到“反思判断力”、“先验原理”、“直观知性”、“类比”这些概念，他们就只能照本宣科地重复康德（还不一定准确），然后加几句外在的评语了事。这种“买椟还珠”的做法，在戴茂堂这里被突破了。在本书中，作者着重考察的倒不是康德美学的那些具体观点（尽管在这方面作者同样有很多创见和洞察），而主要是康德得出这些观点的那种独特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有立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现代视野才能看出来，这就是对自然主义的超越。

作者指出，在康德以前，西方传统的美学要么是认识论的（客观主义的），要么是心理学的。这些美学始终未能摆脱胡塞尔

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的束缚，不是把审美看成对客观事物的摹仿或“反映”，就是看做心灵的一种迷狂状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出来，这两种立场就受到了根本的挑战。在康德那里，所谓“美”决不是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而是主观的一种活动的表象；但这种活动又决不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具有一种“先验的”普遍意义。因此，康德美学的方法论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把鉴赏对象的存在“存而不论”（悬搁），从直观中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本质还原”；另一方面又不停留在这些直观本质的主观心理层面，而是努力为其寻找一种“主观普遍性”（或主体间性）的“先验”根据，从而进到胡塞尔所谓“先验还原”。这就凸现出康德美学方法论的一个极其重要、却常常为人们不注意的现代意义，就是康德早于胡塞尔一百多年已提出了哲学至少在审美鉴赏领域要“超越自然主义”的问题。这一发现不仅仅有助于我们对康德美学价值在现代的全面估价，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康德文本的一个新的入口。康德的许多晦涩难解的原意及他为此作出的许多看似笨拙的努力，在这种眼光之下便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从而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提出的一条方法论原则：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对康德美学的这一最新解读，可说是这本书最重要、最富启发意义的发现。

然而，作者的审慎之处正在于，他并没有任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这是很多做个案研究的中国学者常常不能避免的），而是充分意识到康德思想的“前现代性”。他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了康德美学方法论在走向现象学方法的途中的不彻底性和传统自然主义思维的残留痕迹，归根到底是人类学的痕迹，这种人类学把人当做一个天赋有知、情、意三种心理能力的生物来加以“科学”的考察、分析和分门别类的规定，从而偏离了哲学作为对普遍真理的纯粹探究这一本旨。即使是康德的“先验”，实质上也并非真正的客观真理，而是归根到底落入了心理主义的窠臼，他对自然主义的超越因此也就半途而废。作者立

足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精神的准确理解而对康德哲学作出的这一批评，使我们对康德美学的方法论缺陷洞若观火。

但作者也没有仅停留在用胡塞尔的思想来解读康德这一固定的立场上。难能可贵的是，他力图沟通胡塞尔和马克思的实践论及社会交往理论（这与哈贝马斯等人的致思方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并从这一更高的思维角度来进一步剖析康德美学走出困境的道路，指出了建立在吸收胡塞尔现象学的合理成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感性学”这一现代美学的前景。

纵观全书，我们感到这是目前中国美学界和哲学界理论层次颇高、理论份量很重的一本不可多得的专著。全书立论的整个角度是富有创新意义的，作者对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都有相当程度的钻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十分熟悉，这些都给作者全面透彻地把握这一极为困难的课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作为作者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对这一成果自然是感到欣喜的。但同时也感到，本书虽然观点新颖，论述简练清晰，然而毕竟还处在初创和开拓阶段，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展开。如康德和胡塞尔的理论上具体的承继关系，胡塞尔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切合点的深层次的揭示等等。此外，康德美学方法论对他自己具体的美学观点的全面影响及对我们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感性学（美学）的启发意义，还可以大加补充。总之，这本书不宜看做一种观点和理论的终结，而应看做另一部更大、更完备的著作的纲要或导论，这是我们寄希望于作者以他的聪慧、敏锐和耐心来完成的。

1997年11月，于珞珈山

导 论

整个西方哲学在康德那里有一个根本的变革，因此，研究西方哲学甚至研究哲学不得不研究康德哲学。前苏联美学家戈洛索夫克尔说：“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方，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①而研究康德哲学又不能不研究康德美学，因为康德美学正是康德哲学中的“一座桥”。古留加甚至说：“系统地研究康德哲学应当从美的理论开始，这样一来善和真就会被揭示得更加充分。”^②康德本人也意味深长地把他的美学看做他“全部哲学的入门”。显然，这不仅意味着《判断力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一道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从外在形式上看，没有康德美学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康德哲学；更意味着《判断力批判》的出现是《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而非仅仅出于建构美学体系的需要，这就从更深层面上揭示出：没有康德美学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康德哲学。我们过去重在强调理解康德美学必须从康德哲学入手，这固然不错。但我们现在必须明确，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也必须从康德美学入手，这是康德美学的特殊地位所规定的了的。

①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21～122 页。

② 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89 页。

康德美学的特殊地位带来了学术界对康德美学的普遍重视。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康德美学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历来对康德美学的理解多停留于、满足于从社会性和直观性两方面挖掘其“合理思想”，并从先验主义和心理主义两方面来批判其“唯心主义片面性”，基本上未超出胡塞尔所谓“自然主义”的眼光。从方法论上看，在这里，“自然主义”就是指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即先设定一个对象的客观存在，然后排除主观因素去准确地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它确信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存在的不言而喻性，以及人对外部世界的精确认识的不言而喻性。自然主义者陶醉于自然的先在性和优先性中，强调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把人与自然绝对分离开来，并且极力维护自然的初始性，蕴含着对自然的崇拜。但自然主义者遗忘了自然本身是通过人的反思和实践活动而加以确证的。也就是说，尽管在时间上，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但从逻辑上，人又是自然的先在性的现实基础。在本体论领域，美学中的自然主义态度表现为对美的本原问题的极大关注，如古希腊美学一开始就把美从人那里剥离开去，认为有一个先于人的审美活动而存在的先在实体如“美本身”、“数”、“形式”等等。在认识论领域，美学中的自然主义态度表现为对美的本原问题的知识的无比热心，如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美学一开始就把美的本原问题当成一个自然科学问题来追问，并极力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对这种“先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进行无偏见、精确化的把握^①。

① 显然，我们对于“自然主义”的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理解或使用，既区别于文学中所说的自然主义，也区别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先验方法论”部分所讨论的“自然主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指的是一种原封不动地或照相式地反映现实的文学流派，而这里讨论的自然主义典型地体现在近代自然科学模式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讨论的“自然主义”指的是用非科学的普通理性探究理性知识的方法，这里讨论的自然主义指的正是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一切包括人的精神的方法。

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的理解，西方传统哲学在方法论上是自然主义的。无须辩驳，在西方传统哲学自然主义大背景下探究美学奥秘的康德难免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传统哲学的自然主义的“遗风”，但康德美学又不完全属于传统，而是强烈地显示出超越传统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巨大努力。站在传统的自然主义立场上的人，当然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他们从康德那里看到的全是自然主义的东西，而一旦他们发现康德无法从自然主义角度去解释审美现象、艺术问题时，他们便把康德美学视为一个不成功的尝试，一个有待于发展到他们的自然主义美学观的阶梯。

情况往往是这样：人类的理解力赶不上天才的创造力，以致天才的思想不能变成财富而天才自身也累遭误解。倡导天才论美学的康德无疑是这样一位天才。他的思想不断被人严重误解简直就成了他是天才的“证明”。康德说过：他和他的著作早出现了一百年，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他，并重新研究和运用他的著作。其实，康德仍然过于乐观了一些。至少就美学领域来说，康德的奥义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

我们可以因为《判断力批判》的晦涩而拒绝甚至厌恶康德美学，但我们却无法回避康德所发动的美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并且会因为他美学的超越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巨大魅力和深远意义而尊敬他、喜欢他。显然，康德美学是不可回避的。过去，众多的研究者们以负面的心态简单地把康德美学宣布为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并在方法论上给予其自然主义的定位。这样做当然既容易又简便，但同时也就既遮蔽了康德美学的闪光点，又阻止了我们与康德及其美学继续对话的可能性。这就召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并“活化”（不是“回归”）康德美学，发扬光大康德美学的菁华。康德美学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这不仅为我们研究康德美学提供了条件，更为我们研究康德美学增添了难度。我们深知，如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就必

须尽可能地跳出那不无偏颇的“前理解结构”，去细心地体会康德对美学作曲尽其致的诠释时那份心灵的真切，就必须在新的立场上重新思索康德美学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并给予创造性解读，而不是让权威的“定论”成了探索真理的运思者理智上的重累。

康德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鉴赏家，康德美学的优势主要在方法论层面上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观照康德美学。并且，我们相信，研究康德美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甚至是更深入地研究康德美学本身。因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①，因为“方法先于所有科学本身”^②。现代方法论的日新月异和极大丰富，为我们重新把握康德美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但我们发现，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对于我们重新展开与康德美学的对话具有特别的意义。基于此，我们将尝试性地对康德美学做一种全新的现象学诠释。

本来，从一般意义上看，“美学本来的学科性质与现象学的方法之间有着一种本质上的亲切关系”^③。现象学的真实意图在于拯救人性的危机，而真正关注人性的就是“感性学”（Aesthetik）即美学，因此，现象学是通向美学的；同时，美学作为一门“感性学”几乎天然地具有“回到事情本身”、进行“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的性质，因此，美学又是通向现象学的。现象学美学在当今世界的有力发展更是不断地证明着现象学和美学的亲缘性。

尽管康德经常使用“现象”概念且认真讨论过“现象”问题，而只有几次使用“现象学”这一术语，且不是在胡塞尔现象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7页。

② L.W. 贝克等编译：《康德拉丁著作译、评、注》，纽约1986年版，第187页。

③ 今道友信主编：《美学的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学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但我们还是认为，现象学和康德美学具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性。这关联点主要就在于超越自然主义方面。反对自然主义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主题，而突破自然主义正是康德美学体系潜藏着且不断暗示出来和透露出来的“特别信息”。

其实，《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就已经具有了超越自然主义的重要动向。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审核理性各种功能的界限，发挥理性正当的、合法的权益，防止理性僭越或滥用，其矛头直指传统形而上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一个关于“第一性原则”即“本体”的知识体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方法论基础：作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性原则的“存在之存在”也是“对象”，必须像科学一样用逻辑范畴去把握，哲学就是把握本源性存在的范畴体系，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种哲学思路首先为康德所动摇。康德以知识论上否定的态度指出：“存在”本不可对象化，不能以范畴加以把握，“存在”不是宾词，所谓本源性存在不过是一种“理念”。理念与范畴分属本体和现象两个原则上不同的领域。当康德把知识和道德（真和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加以严格区分时，实际上是反对了“美德即知识”的知识论传统。通过卢梭，康德抛弃了那种知识至上的启蒙理想，打破了科学知识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康德把现象和物自体加以区别，认为知性力只能运用于现象界，不能运用于超验的物自体，从而把自然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所独断设定的“物自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加上“括号”，不予讨论，而把人类认识的唯一对象确定在“现象”之内，并从中探讨人类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因此，在知识论领域内，康德“限制知识”与崇尚知识的欧洲哲学传统格格不入，却与理论上的现象学是相容的。

传统形而上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自然哲学）还是近代哲学（认识论）一直都是以科学的知性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非科学的问题，用自然（主义）思维来消解哲学思维，把精神之谜即把自我

意识、人格和意志自由诸问题当做一个科学上可以解决的问题来研究。而从来不去追问：究竟有什么理由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供在精神科学祭坛的中央？人们给予自然科学认识的这种特权是“合法的”吗？哲学尤其认识论主要甚至唯一地只研究数理科学知识的性质和条件，这种预设的前提是否经受过批判考察？尽管康德青年时代在科学方面接受了牛顿的机械力学，在哲学方面接受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唯理主义，但在英国经验主义者休谟的启发下，康德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失败中认识到：精神主体虽然是一种明显的“事实”，但决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精神领域，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康德看出，以科学为自己形态的哲学本身有着一种内在矛盾：哲学所追求的“本质”似乎在科学的“彼岸”，而以科学的范畴来把握这种本质，无疑是把本质问题当成了一般“事实”问题。其实这正是一切形式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所在。康德哲学通过在作为经验知识的范畴和作为本源性的理念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竭力反对了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打破了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部独断论体系和科学万能论的迷梦。他指出，哲学必须放弃那种对科学的无根据的奢望和无批判的态度，放弃那种“仅仅借助逻辑就对对象作出判断”的独断论偏见。

正是康德哲学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超越自然主义的动向极大地启发了胡塞尔提出一条通向现象学的超越自然主义的思路。康德雄心勃勃的“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以宣称对人类“知识”、人类“理性”作彻底的“批判”考察而完成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在胡塞尔的眼中，康德是理性批判的伟大倡导者，只不过他自己的批判比康德的仅仅是纯粹理性的批判更加彻底。胡塞尔的批判是对于一切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能使形而上学而且能使整个哲学成为“科学的”。康德对胡塞尔的巨大影响，从胡塞尔把他的现象学认识论称为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就可以得到证明。胡塞尔关于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划分、现象学还原的意义之规定等

均和康德哲学密切相关。胡塞尔强调哲学之先验性、纯粹性，是自觉地接续康德的传统。瓦尔特·比梅尔在《现象学的观念》的“出版者序言”中指出，胡塞尔正是在深入研究康德哲学中产生了作为先验哲学、作为先验唯心主义的现象学的一系列构想。

当代现象学本来源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但胡塞尔却更乐于指出康德的不足。缘由在于：康德的这种超越自然主义与胡塞尔现象学相比是极不彻底的。首先，康德哲学是以实证科学或精确科学为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采用的仍然是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知性分析法），即知性地、冷静地、实证地分析客观对象，并作了不少预先假设。康蒲·斯密就指出：“虽然康德把应用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的方法称之为‘先验方法’，其实他在一般性质上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假设方法。”^① 康德批评旧形而上学过于自信地以为用认识的范畴就能把握世界万物的本质，以致陷入独断论。其实，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仅没有摆脱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相反，康德正因为从主客观关系、从认识论上立论，才会有一个不可知的领域，才会有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依然有现象学深深厌恶的把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作法，在方法上也强调推理、假设，即理性方法。《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判断就纯粹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上帝、自由、灵魂不朽）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合理（合逻辑）的推断。胡塞尔说过：“无穷无尽的假设和无穷无尽的证实就是自然科学的特有本质，就是它的先天的存有方式。”^② 自然科学方法有两类：实证和证伪（假设），这同时出现在康德哲学中。无论是实证还是证伪，讨论的都是命题与事实的

① 康蒲·斯密：《〈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页。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关系问题（一致或不一致）或相合问题（是或不是），因此都是自然主义的。卡西尔指出：“自由如何与必然相合，纯内在的思想的自我决定如何与客观的价值相合？这是康德理性的批判的全部核心问题。”^①

科学知识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核心地位非常明显。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以探求概念系统的“真知识”来区别智者们的“假知识”，首次把主体的能动性或自我提到了哲学面前。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与“客体性”相对立的“主体性”原则。这就是说，理念性的知识即“真知识”不能外求万物，而要转向内求于己——“主体”。这种主客二分的原则被近代哲学的苏格拉底——康德在新的形态下加以发展。康德的实践理性领域就是纯粹的主体性原则。他努力以先验哲学为科学之必然性辩护，以保证“科学之宫”不致于被经验主义之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之空洞无物所颠覆。所以，苏格拉底和康德成为西方哲学史上两个划时代的人物，正是他们分别在古代和近代树立起了一个绝对的主体性的原则，使人们沿着这个方向寻求真知识。在康德那里能真正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之美名的，实际上只有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的“理性批判”或“知识批判”所考察的实际上主要是“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而胡塞尔则主张停止对任何自然知识的利用，“中止”自然思维，走现象学还原之路。康德把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先验性建立在“先天性”之上。所谓“先天性”乃是指“前件”作为“结论”的逻辑条件。显然，康德并没有根本上跳出欧洲的科学传统，在康德那里，所谓先验的必然性、普遍性仍建立在逻辑的必然性基础之上。而在胡塞尔看来，这正是康德现象学不彻底的地方。“先天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不占重要地

^① 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3卷，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